

欧阳修文献学研究

余敏辉 著



作者参阅大量第一手材料，通过对欧阳修文献学背景的考察，具体探讨了他在文献收藏、著录、校勘、辨伪、注释，以及金石学、家谱学方面的成就，并对他的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进行评析，进而对他的文献学地位和影响做出客观评价。



人民出版社

欧阳修文献学研究

余敏辉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责任校对:段文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修文献学研究/余敏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8999-7

I. ①欧… II. ①余… III. ①欧阳修(1007~1072)—文献学—研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194 号

欧阳修文献学研究

OUYANG XIU WENXIANXUE YANJIU

余敏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999-7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本书是余敏辉的博士论文。

说来也是投缘，我既是余敏辉的硕士导师，又是他的博士导师，所以，深谙他选择此题作为研究对象的想法和取向。

欧阳修是北宋集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前人对其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颇多，亦很深入。然而，却大多忽略了他“在文献学领域独树一帜，卓然成家这一重要事实，而已有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这些称谓又不能囿其范围”。余敏辉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才决定填补前人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疏略，这即是他选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欧阳修参与创立的金石学属于历史文献学，在学术界已无异议。然而，欧阳修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哪些应属历史文献学，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所属范畴没有争议的部分，如对欧阳修予修《崇文总目》、主编《新唐书·艺文志》、编撰《集古录跋尾》，编校四部书，排《系辞》、毁《周礼》、黜《诗序》，撰《诗本义》、《易童子问》等等，都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间不乏精彩之处，令人叹服。而对于所属的范畴尚未确定的部分，余敏辉更是倾其全力，多方探求，确定它的历史文献学属性。如欧阳修曾编《欧阳氏谱图》，将涉及家谱的资料区分为世系、世系录、谱序、恩荣录、谱例、像赞、图、传志、诵芬录、懿行录、宗规家训、文献、志、修谱人员、陈设图、领谱字号等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对文献的整理和分类，因而这些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属历史文献学范围。余敏辉的这一新见解极见其研究功力和创新精神，它必将引起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研究兴趣。此外，余敏辉对欧阳修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的归纳论析亦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树。

对于欧阳修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突出成就，本书特别关注他率先大规模地收集金石文献，并且将它们加以著录，更以跋尾形式对这些文献作了初步研究；继而又阐明他搜辑唐人著述，弥补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不足，开启了后人补史艺文志的先河等等，从而展示了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大家、史学大家，而且还是历史文献学大家，使我们对欧阳修的学术成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客观的评价欧阳修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本书对欧阳修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并不只是单纯地探求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把欧阳修放在北宋前期这一大的学术环境之中，从他的志向、经历，剖析了他必然重视历史文献学的事实，追溯了他成功的原因，并指出欧阳修能认识运用历史文献学与文学、史学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这一点，对于专业日趋细化的今天，则更能给学者以启发。质言之，作者在努力使读者在知其然的同时，又进而使之知其所以然。这种深化读者认识的努力，显然也是值得称道的。

余敏辉的这部书，涉足前人较少关注的领域，既有拓荒的优长，就不免留有某些疏略的可能，但无论如何，它的出版，必将增添历史文献学新的话题则是毋庸置疑的。

是为序。

曾贻芬

2010年3月

北京京师园

绪论

苏轼在为欧阳修的《居士集》作序时，曾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①可见当时人就已公认欧阳修是兼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当代学者也大多赞同此说，认为欧阳修从政颇有建树，治学更是大放异彩，光耀千古，如钱穆赞誉他为“通人”，说“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②；刘德清推崇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③；黄进德称颂他为“北宋杰出的文坛领袖”，是一位“兼擅各体的大作家，也是史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④；孙钦善欣赏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学者”^⑤；吴怀祺先生（按：行文中授业系统老师均称先生，其他则直用其名，特此声明）还指出，“欧阳修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他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开风气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⑥。通考欧阳修的学术成就，他的治学范围确实很广博，造诣都极精湛，因而古今学者的上述评价并非溢美之词。不过，由于学者们的专长不同，所视的角度又各异，因而仍有不够全面之嫌，因为他们有所忽略了欧阳修在文献学领域独树一帜、卓然成家的这一重要事实，而已有的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这些称谓又不能囿其范围。其实，欧阳修既是一位胆识过人、开一代风气的文献学家，又是一位经世、求实且具有一定科学理性精神的文献学家；他的文献学成就卓著，特色鲜明，不仅有力促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史书编纂和经学研究，而且取重于当时，直接规定了宋代文献学的走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毋庸置疑，欧阳修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贻芬、崔文印二位先生所评价，他“不

① 苏轼：《居士集·序》，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卷5，第2756页，中华书局，2001。

② 钱穆：《师友杂忆》，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第329页，三联书店，1998。

③ 刘德清：《欧阳修论稿》，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④ 黄进德：《欧阳修评传》，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 孙钦善：《欧阳修学术研究·序》，见顾永新著《欧阳修学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⑥ 吴怀祺：《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见刘文源编《庐陵文章耀千古》，第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但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①。

一、“文献学”界说

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对“文献学”^②的界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而研究欧阳修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要明确界定“文献学”的内容、范围 and 任务。为此，有必要对文献学的由来和发展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全面考察。

白寿彝先生认为，文献学作为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虽然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却还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③也就是说，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如孔子整理六经，就是最早的文献学工作；尤其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奠定了文献学的基本范式，后人就冠以“校雠学”名之，正如张舜徽所说，中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④。至于目录、版本、校雠三者之间的关系，王欣夫指出，“这三个内容本来是三位一体的，不应该分什么先后”^⑤。当今许多学者都认为，虽然目录、版本、校雠构成了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但并不仅限于此，如东汉郑玄遍注群经，解读经学文献；南宋郑樵撰《通志·校雠略》，总结文献工作；明人胡应麟著《四部正讹》，通考古今伪书；清代范钦藏书“天一阁”，驰名海内；乾隆敕编《四库全书》，嘉惠士林；严可均辑汇散佚，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校雠理论，这些都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

不过，尽管我国文献学的历史悠久，著述如林，名家辈出，但把“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并用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却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才由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俩最早提出来，他们一九二八年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于一九三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⑥，郑氏兄弟援引并发挥了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之说，首次提出了“文献学”这一新概念：

①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第349页，商务印书馆，2000。

② 余按：“文献学”应分为古代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本文专指前者而言。

③ 参见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再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④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⑤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⑥ 郑一奇：《中国文献学概要导读》，见《中国文献学概要》，卷首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①通考全书章节内容，所论六个方面“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研究中有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②，它与刘氏父子开创的文献学一脉相承，即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心，但论述的范围已有所扩大。一九五七至一九六〇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文献学课程，认为“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③。讲稿《文献学讲义》后经他的学生徐鹏整理，于一九八六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这部著作，大体反映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文献学科体系的认识。

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以“文献学”、“古文献学”、“古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命名的文献学著作和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它们一方面仍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点，但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如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的“绪论”和“前言”中，阐述“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虽然特别强调了文献整理、编纂、注释工作，超出了前人校雠学即文献学的认识，但实际上却更接近于历史编纂学和广义的史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版），还论及文献的体式、文献的收藏与阅读，以及丛书、类书与辑佚书。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指出“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④。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认为古文献学“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⑤。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第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③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4—5页。

④ 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第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⑤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第1—3页，中华书局，1994。

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试图突破文献学即“文献整理研究之学”的基本模式, 分为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理论编, 并把这些内容熔铸为一体, 努力建构文献学的完整体系。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齐鲁书社一九九八年版), 除传统的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之外, 又加上“典藏编”共成四编, 对文献学作了全面的总结。而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版), 则加大了对“地方志与家谱”、“总集与别集”以及出土文献和敦煌文献的介绍。此外, 还有一些其他说法, 如傅振伦认为: “文献学就是图书之学。包括口碑, 往事的追忆回忆, 不见经传的古迹文物的再现、勘查, 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民俗调查等等资料在内。据言之, 文献学也就是目录学。”^① 邵胜定则指出: “自有大规模文献典籍整理工作以来, 就产生了一门以文献典籍整理为中心任务的学科——文献学。……如果都能从学术史的事实出发, 看到有一门科学在文献典籍整理工作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这就是文献学。”^② 桑榆还作了如此界定: “古文献学实际上是指研究古文献的产生、演变、聚散情况; 对古文献进行分类、编目、版本鉴定; 文字校勘、注释; 佚考考证辑存; 篇帙分类、编纂。一句话, 对散乱难懂的古文献资料进行加工整理, 使之条理化、系统化、通俗化、明朗化、真实化。”^③ 等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 当今学者们除了对“文献学”的学科称谓有较大的分歧之外^④, 还在对“文献学”的内涵和范围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从实际情况来看, 正是由于文献产生之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失真、难解以及乱序等诸多问题, 文献学才应运而生的。由此看来, 当前“文献学”的界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有的失之宽泛, 把文献学等同于广义的史学。此论滥觞于梁启超, 他在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谈到“清初史学之建设”时说: “明清之交各大师, 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 即文献学。”^⑤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也把“文献学”分为广义和狭义, 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分的二十四门,

① 傅振伦:《释文献》,《文献》1986年第1期。

② 邵胜定:《文献学名实辨》,《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3期。

③ 桑榆:《文献学中有关概念的梳理》,《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④ 余按:当前“文献学”的学科称谓比较杂乱,可参见何林夏《“历史文献学”之我见》,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6辑,第204—21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5页,东方出版社,1996。

真是无所不包,可说是广义的‘文献学’”^①;张舜徽甚至认为整理文献的更重要工作,是“编述为内容丰富的通史”^②。不过,随着学科分类趋于细化,目前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已很少。

其二,有的又失之狭窄,把文献学仅限于目录、版本、校勘“三位一体”。如王欣夫《文献学讲义》是其代表作;而熊笃、许廷桂编著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仅加上“注释学”而已。当前文献学著作和教材,都是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干内容,但涉及的范围一般都已扩大到辨伪、注释、辑佚等。

其三,有的则失之芜杂,把文献的形成和产生——编纂学也当作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有学者提出,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的产生、发展、搜集、整理、传播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应用性科学。”^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文献的产生不应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不过,如果把文献的编纂形式分为著作、编述和汇纂三大类的话,那么前两类都属于创作,是一种新型文献的产生,而汇纂则是原有文献内容的重新排列组合,相对来说,个人的主观成见很少,具有原始资料性这一特征,如丛书、类书、起居注、实录、家谱、档案之类,因而也应是文献学所要关注和考察的,这是本文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新看法。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文献学是以传世和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核心内容,通过目录、版本、校勘,还包括注释、辨伪、辑佚以及汇编、收藏等各种方法和手段,主要是解决文献产生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障碍、文字隔阂以及杂乱、讹误、伪滥、散佚等诸多问题,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恢复文献的原貌,求得事实的真相。因此,本文比较赞同对“文献学”作这样的界说,即“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④。

二、本书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欧阳修的文献学成就、特色、影响与评价及其成因。旨在

①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4页。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363页。

③ 何林夏:《“历史文献学”之我见》,见《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6辑,第203页。

④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第2页,学苑出版社,2001。

通过对欧阳修生活时代的宋廷右文政策、宋儒的文化精神、宋初的文献学发展,以及欧阳修的学术人格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揭示欧阳修文献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然后分别探讨欧阳修在文献的收藏、著录、校勘、辨伪、注释以及金石学、家谱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欧阳修的文献学的特色,如文献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然后从欧阳修文献学对他的其他学科,以及对宋代文献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并结合对宋代学术文化和后世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来确立他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

从宏观上看,一方面,有助于全面认识宋代学术文化成就,以及它对清代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宋代文献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了解其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宋代更是呈现出规模恢宏、气象生动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学术界通常把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按:考据学和文献学关系最为密切,但并不等同)并称于世,理学几近成为宋学的代名词,致使人们对宋代学术文化的认识有所偏颇。其实,宋代学者大都重义理不废考据,无论治经研史,通常先行考据,后求义理,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共同构成了宋代学术研究方法的两翼。因而宋代的考据学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周予同就认为“宋学与朴学也有相关之处,清代朴学好多东西是从宋学而来的”,“我们不能认为宋学与清代汉学无关,一刀两断,这是机械论”^①;白寿彝先生也说:“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就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始的。”^②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宋代在文献学领域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如收藏学兴盛、目录学完善、校勘学成熟、版本学产生、辨伪学风行、辑佚学初起、注释学变革、金石学创立、家谱学转型,以及文献学理论专著出现,等等。然而,这些都是从横向方面概括而言,虽然大体不错,但如果从纵向方面,即从“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文献学思想、方法、内

^①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②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514页。

容还是文学学分支学科的具体成就，北宋和南宋情况不一样，尤其是北宋时期前后区别就更大，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当今学者从这方面来进行思考、探讨还显得不够，人们还看不出宋代文学学发展的由来走向、升沉起降，以及它和宋代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和文化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微观上看，一方面，有助于正确评价欧阳修文学学成就及其对宋代文学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并通过欧阳修这一代表性人物透视出宋代学者的一些治学特点；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当前学术界对欧阳修文学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现状，以及脱离欧阳修的其他学术成就而孤立地研究他的文学学的缺憾。仅就北宋文学学的发展而言，随着“庆历新政”的实施，疑古思潮兴起并很快波及到学术各领域，文学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面貌，这是由一大批学者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而其中欧阳修则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他收集大量图书和金石铭刻，寓研究于整理之中，提升了文献的收藏品位；著录图书，别开新制，所编撰的书目和序跋特色明显；遍校四部古籍，力倡“慎改”原则，且首次运用“金石校勘法”，成果十分突出；大胆疑经，考辨古史，是有宋一代疑古辨伪思潮的主要发起者；不惑传注，发明经旨，推动文献注释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此外，他还对所收集金石进行编目跋尾，考经证史，创立了文学学的新领域——金石学，以及编修家谱，创制“五世一提”谱图法，振兴了家谱文献，这些众多的、带有开风气意义的原创性文学学成就，以及他的“求国家之治”的文学学旨趣，实事求是的文学学原则，科学理性的文学学思想，既重义理阐发、又重文献考据的文学学方法，都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确立了他在宋代文学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然而，就当前欧阳修的学术成就研究而言，以往的成果更多集中在文学，其次是史学和经学，而在文学学领域，至今还无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题性质的研究。其实，欧阳修的文学学成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而这也成为他从事其他学术研究的前提和条件，如他的文学学就和文学、史学、经学密不可分，其中的内在关联是学者所不应忽视的。

三、本书研究的方法

本文采用由一般到整体研究法，即分别从欧阳修收藏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注释学、金石学、家谱学入手进行探讨，进而从整体上对欧阳修文学学成就做出恰当评价；综合归纳法，即在研究欧阳修文学学成就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他的文学学旨趣、原则、思想和方法；比较研究法，即把北宋文学学史分为前

后两个阶段，从文献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

此外，关于本课题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欧阳修全集》，在此有必要对它的版本作一简要说明。欧阳修文集的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版）之时，在对传世版本进行全面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①，精选底本，广选校本，并参考其他资料，进行了精考详校，应该是目前欧阳修文集当中质量最好、最权威的一种版本，故为本文所采用。至于欧阳修的《诗本义》，采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他主修的《新唐书》、私撰的《新五代史》，则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① 余按：王岚《欧阳修文集版本流传系统辨析》一文，对欧阳修文集版本的梳理和考辨尤为详实，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辑，第103—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目 录

序	曾贻芬 1
绪论	1
一、“文献学”界说	2
二、本书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5
三、本书研究的方法	7
第一章 欧阳修文献学的背景	1
第一节 宋廷的右文政策	2
第二节 宋儒的文化精神	6
第三节 宋初的文献学发展	10
第四节 欧阳修的学术人格	13
第二章 文献的收藏、著录和校勘	
——欧阳修文献学成就之一	17
第一节 文献的收藏	17
一、“力莫如好，好莫如一”	18
二、藏书一万卷	22
三、《集古录》一千卷	30
第二节 文献的著录	38
一、预修《崇文总目》	38
二、主编《新唐书·艺文志》	42
三、编纂《集古录跋尾》	47
四、撰写书序与跋	52
第三节 文献的校勘	56
一、“校讎之职，是正为难”	57
二、“要知改字当慎”	59

三、首倡“文物校勘法”	63
四、遍校四部，数量惊人	67
第三章 文献的辨伪和注释	
——欧阳修文献学成就之二	71
第一节 文献的辨伪	71
一、“众辞淆乱质诸圣”	72
二、排《系辞》、毁《周礼》、黜《诗序》	74
三、攘斥“伪说之乱经”	80
四、提倡“不穷远以为能”	82
第二节 文献的注释	86
一、“公心通论”	86
二、探求《诗》义	89
三、阐发《易》理	105
四、考究《春秋》大义	110
第四章 金石、家谱文献的开拓	
——欧阳修文献学成就之三	117
第一节 金石学	117
一、欧氏金石学著作辨析	118
二、《集古录目》编撰	125
三、“与史传正其缺谬”	128
第二节 家谱学	137
一、编修《欧阳氏谱图》	137
二、“欧阳之谱”的毁与誉	141
三、“视他姓氏宜为先备”	144
第五章 欧阳修文献学的特色	150
第一节 “求国家之治”的文献学旨趣	150
一、痛斥“千年佛老贼中国”	152
二、黜伪说，“志古明道”	155
第二节 实事求是的文献学原则	160
一、“惟是之求”	160

二、“慎于传疑”	163
第三节 科学理性的文献学思想	170
一、“学出己见”	170
二、“不苟立异”	172
三、“简易明白”	175
四、切于人事	177
第四节 崇尚考证的文献学方法	179
一、文献佐证法	180
二、情理推断法	182
三、逻辑论证法	185
四、“二重证据法”	188
五、综合考证法	190
第六章 欧阳修文献学的影响与评价	193
第一节 欧阳修文献学对他的其他学科的影响	193
一、文学	193
二、史学	199
第二节 欧阳修文献学对宋代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209
第三节 欧阳修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212
结语	216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7
又记	229

第一章 欧阳修文献学的背景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生活的时代，约在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统治期间，这是宋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辉煌时期，政治昌明，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文化发达，科技进步，教育兴旺，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表现为社会危机加深与改革进入高潮^①。而纵观欧阳修的一生，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立志高远，正直敢言，赢得了“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②的赞誉，不过一生却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沉浮，历经坎坷和磨难^③；在治学方面，他涉猎广泛，博学多能，各自名家，成为当世公认的一代学术宗师。

人们常说“知人论世”、“知世论人”。因此，研究欧阳修文献学，既要考察他生活的时代，还要剖析他的生平和学术，特别是要注意到他不是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从事文献学工作的，因而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和学术风气的深刻影响，同时还会受到他是集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于一身的特殊身份的重要影响。但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探讨可能会流于宽泛和空疏，那么，以下着重从北宋学术文化的概况、文献学的发展水平和欧阳修的治学特点这

① 余按：北宋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960—997）包括宋太祖、太宗两朝，中期（997—1085）即宋真宗、仁宗、英宗以及神宗四朝，后期（1085—1127）即哲宗、徽宗、钦宗三朝，欧阳修的生活时代是在中期。不过，就北宋文学史来说，以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标志，又可分为明显的前后两个时期，而欧阳修则是这个前后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南宋文学学的发展，从总体上说还是北宋后期文学学的一种延续。

② 王安石：《祭文》，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卷3，第2685页，中华书局，2001。

③ 余按：欧阳修一生命运多舛，仕宦生涯三起三落。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书言事，被吕夷简诬以“朋党”而降职外贬，司谏高若讷趁机投井下石，欧阳修义愤填膺，贻书高若讷，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初次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等执政，欧阳修复职返京，知谏院，连上奏疏，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奉使河东、河北，不久新政失败，主要参与者相继罢离，欧阳修慨然上《朋党论》，遂遭旧党忌恨，诬为韩琦不修，于庆历五年再贬滁州，复徙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重返朝廷，主修《新唐书》，不久出使契丹。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痛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之后，欧阳修曾知开封府，任礼部侍郎，迁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复遭政敌谗害，于神宗熙宁元年（1067）第三次被贬知亳州。欧阳修晚年，连乞谢事未获准，时值王安石变法，欧阳修持怀疑和抵制态度，并明确反对青苗法，使王安石不满。神宗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卒后谥“文忠”。